漂亮的姑娘,我不愿意多浪费脑汁。”小伙子大献殷勤,他这是在对扮演的搭车女郎说话,不是对自己的女朋友说话。这自大的话让女友愠怒,她反唇相讥:“你不觉得把自己估价过高了吗?”

分层的混淆让两人弄出了误会。在这段小说的文+戏中,两者之间并没有时间差,哪怕是小说世界中演的戏,也具有演示叙述的“同时性”,除非媒介改变(如演员彻底转化为人物),分层便不清楚。跨层的“推入”与“收拢”可以任意发生,以至于人物竟然不知道自己在特定时刻在哪个层次,忘了他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身份,说错话得罪了女友。这一段小说描述充分显示了不同媒介叙述之间的张力陷阱:文字的记录类叙述一旦分层,有时间差;身体语言的演示类叙述一旦分层,没有时间差,只有框架隔断。一旦如《搭车游戏》用文字描写演出,分层间隔,就成为人物的主观意图。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热拉尔·热奈特. 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2] 赵毅衡. 苦恼的叙述者[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3] 瓦尔特·本雅明. 讲故事的人[A]. 陈永国,等. 本雅明文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 Genette. G.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5] Richardson. B. Narrative Dynamics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Hofstadter, D. G. 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M]. New York: Penguin, 1979.

〔赵毅衡(1943—),男,广西桂林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符号学、叙述学研究。〕

历史:作为一种叙述

李卫华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一、广义叙述学:更具普适性的叙述研究

广义叙述学是赵毅衡于2008年提出、至今仍在不断完善的叙述学理论。赵毅衡认为,广义叙述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叙述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1]。广义叙述学的提出,是对于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当代文化的“叙述转向”的回应。这一转向发生于1970年代,蔓延至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1990年代形成了普遍性的理论。而引领这一大潮的是“新历史主义”运动。

“新历史主义”以海登·怀特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为代表,开启了以叙述研究改造历史学的运动,并形成了全新的历史观。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并不是过去发生的客观事件,而是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是一些叙述性的文本,所谓“客观事件”只不过是后人根据前人的“叙述”所作的推测。而任何一种叙述都不会是中性的,必然会带上叙述者的主观色彩,因此,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海登·怀特极力强调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文本,“叙述”左右着历史的呈现。它引导人们从对某种历史叙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通过对历史叙述中的“诡计”的发现和分析,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然而,由于海登·怀特对历史材料的某些忽视,也招致了许多批评。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指出:“当代批评家倾向于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描写过去事情的方式,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是由一些本文和一种阅读、诠释这些本文的策略组成。”[2](P56)应该说,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海登·怀特实际上是“悬置”了历史事实的存在,只关注它是如何被叙述的。对于以求真为标的、以探索历史事实为己任的史学研究来说,海登·怀特的理论显然存在明显的偏颇。

但是,“新历史主义”运动推动了将历史视为一种“叙述”的研究,其影响溢出历史学,冲击了整个人文学科。1980年代以后,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乃至医学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叙述转向”,至1990年代,终于形成了对于“叙述”的普遍关注。跨越学科界限寻找叙述规律,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研究的新潮流。就叙述学建设而言,“经过叙述转向,叙述学就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既然许多先前不认为是叙述的体裁,现在被认为是叙述体裁,那么叙述学就应当自我改造:不仅要有处理各种体裁的门类叙述学,也必须有总其成的广义叙述学。”[3](P17)广义叙述学不是各门类叙述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为不同门类的叙述学搭建可以相通的研究平台,从而以跨学科的方法和更为宽阔的理论视野,为涵盖各个学科的叙述提供有效而通用的理论基础。

从广义叙述学出发,历史也是一种“叙述”,而只要是叙述,就“不可能‘原样’呈现经验事实。在叙述化过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程中，不得不对情节进行挑选和重组。经验的细节充满大量无法理解的关系，所谓‘叙述化’，就是把凌乱的细节整理出意义，把它们‘情节化’(emplotment)，事件就有一个时间/因果序列”[4](P321)。而对于“新历史主义”过分忽视历史事实、甚至将历史等同于文学虚构的做法，广义叙述学也作了纠正。在重视叙述的结构性、修辞性的基础上，广义叙述学也明确意识到了叙述的“事实性(factual)/虚构性(fictional)”的区分：“虚构性/事实性，是叙述最重要的分类标准。”“法律文本、政治文本、历史文本，无论有多少不确切性，发出者是按照事实性的要求编制文本，接收者也按照事实性的要求构筑文本意义。”[4](P325—326)。更进一步说，事实性叙述是一度区隔，叙述与经验事实的区隔，这种区隔决定了叙述不等于经验事实，但以近乎“透明”的形态直接指向经验事实；而虚构性叙述则是二度区隔，即二度媒介化，与经验世界隔开了双层距离，因而产生了一种“不透明”的效果[3](P72—76)。这样，既肯定了事实性叙述的叙述性，又强调了事实性叙述与虚构性叙述的根本区别，显示出辩证而全面的理论特征。

作为这样一种理论追求的现实实践，广义叙述学一方面与西方的叙述学形成了积极的对话；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下面以金圣叹的历史评点为例，谈一谈广义叙述学的启示。

二、跨学科的方法与辩证的历史观

跨学科的方法是广义叙述学的突出特征。叙述学发展至今，已经历了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两个阶段，二者都以文学叙述、特别是小说叙述为研究的中心，因此形成了严重的“体裁自限”。后经典叙述学有时也关注小说以外的领域，但只是允许别的学科“比喻性地借用”叙述学的术语，并不试图建立一种涵盖各个学科叙述的叙述学。因此也不能有效地回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出现的“叙述转向”。广义叙述学把叙述看成是人生在世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3](P2)。它不专注于某一门类叙述的研究，也不是各门类叙述研究的叠加，而是试图寻找叙述之为叙述的普遍规律[3](P6)。广义叙述学的这一理论旨趣，对于明清评点学、特别是金圣叹的历史评点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金圣叹一直被认定为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他的评点文字也被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个组成部分，而金圣叹的历史评点一直被作为其“文学批评”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例如，有学者提出：“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形成了两组序列：‘六才子书’是他从事文学批评的一组序列，而‘六才子书’以外的批评，诸如《天下才子必读书》和《贯华堂选批唐诗》等则构成了他文学批评的另一组序列。……作为第一序列的‘六才子书’的批评是金圣叹生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组序列则不然，这些批评活动更多地是出自一种外在功利的需求和目的……因而这是一种近乎‘教科书’式的批评体式。”[5](P13—15)显然，这是把以《左传》等历史著作为主要评点对象的《天下才子必读书》，也放入了“文学批评”的范围。

囿于这样的思维框架，金圣叹的历史评点一直依附于其小说、戏曲评点等正宗的“文学批评”，处于次要的、被忽视的地位，学术界对其评价也一直不高，认为它仅仅是“就文论文”[6](P1)的教科书式的点读，是金圣叹为了教育子侄而自编的教材而已，其水平远不能与金批《水浒传》、《西厢记》相媲美。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金圣叹历史评点的意义和价值很难得以彰显。

在金圣叹生活的明清之际，并无今日之“文学”的观念。当时的评点家评点的对象是“诗”、“文”，探讨的是诗文背后共同的创作规律。金圣叹常将《水浒传》与《史记》、《战国策》等作比较，而比较的目的则在于探讨其共同规律，例如：“《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此书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不惟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来”[7](P15)。在评点《西厢记》时，金圣叹又说：“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盖《西厢记》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西厢记》纯是此一方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一方法。”[8](P12—13)显然，明清之际的评点家所关注的不是某一文类、某一体裁的特殊规律，而是将历代诗文中之优秀作品放在一个研究平台上加以审视，寻找文之为文、诗之为诗的共同规律。

明清诗文评的这一特点，恰与广义叙述学不谋而合。广义叙述学以跨学科的方法，探讨涵盖整个人文学科领域的各门类叙述的叙述性，这一宽阔的理论视野比狭窄的“文学批评”更适于分析明清的诗文评点。就金圣叹的历史评点而言，如果不是把它当作今日之既定的“文学批评”观念的例证，而是将其作为对于历史“叙述”的审视，则不难发现其独特的价值：金圣叹以其对历史叙述性的深刻认知，敏锐地发现了那些一直被视为经典的史学著作自身的悖论，并对之进行了颠覆性的解读，显示了金圣叹超人的胆识和才学。

辩证的历史观是广义叙述学的又一特征。如前所述，广义叙述学既肯定事实性叙述的叙述性，又强调事实性叙述与虚构性叙述的根本区别；而金圣叹的历史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观,与广义叙述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金圣叹承认历史叙述的事实性:

>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7](P15)。

"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即承认历史事实的先在性,强调历史写作不能像小说那样,"只是顺着笔性去"。但另一方面,在金圣叹看来,历史虽以"事"为基础,但仍是一种"文",'事"只不过是"文"的材料,"文"赋予"事"以形式,也赋予"事"以意义:

> 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如司马迁之书,其选也。……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是故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7](P539)。

换言之,历史也不过是一种叙述,在这种叙述中"文"比"事"更为重要,作者通过"以文运事",已经形成了叙述与经验事实的区隔。如前所述,这种区隔一般被认为是"透明的",但这种"透明性"其实只是假象,是再现制造的幻象,不随时注意这一点,就会导致"再现谬见",即忽视区隔的隔断作用,误以为再现就是现实[3](P75)。这正是一般人阅读历史的状态,即把历史文本中所叙述的事件当作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来看待,而不考虑再现文本的区隔边界。在这种阅读中,历史文本就是巴特所说的"可读的文本"[9](P127),读者则是这一文本的消费者和接受者。而金圣叹的历史评点则是把历史由"可读的文本"变成了"可写的文本"。与一般人阅读史籍是为了获取历史事实不同,金圣叹的历史评点是为了剖析行文的结构与修辞,发现作者"运事"中的"算计",揭露"文"对"事"的"予夺"。简言之,金圣叹在历史评点中,不是被动地接受所叙之事,而是主动地剖析叙事之文。通过剖析,揭示文本自身的悖论,发现貌似"透明"的再现区隔的不透明性。

三、历史评点:对再现区隔的揭示

金圣叹的历史评点集中于《天下才子必读书》中,其中包括对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新五代史》等诸多历史著作的评点。

《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中的名篇,金圣叹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和《左传释》中两度对之进行评点。两度评点的文字繁简不同,《左传释》繁而《天下才子必读书》简,但都致力于对文本自身悖论的发现、对"再现区隔"隔断作用的揭示,最终构成了对原文的颠覆性解读。在《天下才子必读书》中,金圣叹将《郑伯克段于鄢》分成前后两半进行解析。"前半,狱在庄公,姜氏只是率性偏爱妇人,叔段只是娇养失教子弟。后半,功在颍考叔,庄公只是恶人到贯满后,却有自悔改过之时。"[6](P17)这段总评已显示出金圣叹作为文本生产者的积极主动姿态。从《左传》原文来看,姜氏及共叔段的错误远远大于郑庄公。姜氏因生庄公时难产而厌恶庄公,本就缺乏起码的母爱;屡次向武公要求废长立幼,是以个人偏爱代替政治考量的昏聩做法;庄公即位后,姜氏仍为段请制、请京,更是拙劣的乱国之举。而共叔段仗着姜氏的宠爱,不但做了"京城大叔",而且"令西鄙北鄙贰于己",后又"收贰为己邑",终至于"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这已是公开的叛乱。庄公则是外宽内紧,既能一忍再忍,又能抓住时机,出兵讨伐,大获全胜。姜氏参与叛乱,本应受到严惩,但庄公孝心不泯,在颍考叔的启发下,终与姜氏和好如初。如果仅仅作为文本的消费者和接受者,从《左传》原文中看到的庄公,必然是一个政治成熟而又宽厚仁爱的贤君形象。

但金圣叹以其独到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左传》原文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姜氏与共叔段一再率性妄为,早就引起众人的不满和警惕,祭仲、公子吕、子封等人多次劝谏庄公,不能再放纵姜氏与共叔段,庄公都听而不闻。而大叔"将袭郑"、夫人"将启之"这样联合谋反的大事,祭仲不闻,公子吕不闻,子封不闻,偏是公闻,随即讨伐。金圣叹认为,"将袭郑"、"将启之"的二"将"字,"明明疑狱"[6](P17)。"将"是对于未来行为的描述,"将袭"即"未袭","将启"即"未启",既然"未袭"、"未启",庄公何以知其"将袭"、"将启"?众皆不闻,庄公何以"闻其期"?显然,庄公处心积虑欲除其母其弟,已非一日。先是故意纵容,引发众人不满;随后再罗织罪名,将其一举击溃。所以,"大叔与姜氏诚冤",祭仲、公子吕、子封不过"梦中人"尔。全篇都是"庄公心地",不是"大叔作孽",读此篇只知大叔骄横、大叔痴者,"吾谓卿痴不减大叔也!"[6](P448)

经过金圣叹的解读,《郑伯克段于鄢》中的郑庄公形象,就由贤君变成了一个阴险狠毒、害母害弟的伪善之人。历史总是统治者的历史,当叙述者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进行叙述时,其对事实的取舍、加工、重组,总是使事实呈现出有利于统治者的因果关系。而金圣叹则善于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破绽,破解叙述者编码的"诡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计”,正视叙述与事实的区隔,寻求对同一事实的另一种可能的叙述。

金圣叹对《左传》其他篇目的评点也是如此。例如《庄公戒饬守臣》一篇,写的是隐公十一年郑庄公联合齐、鲁攻下许国,许庄公奔卫,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并向其陈述了一番占领、处置许国的理由和措施。话讲得冠冕堂皇,当时的君子都评论他处理此事“知礼”(合于礼)。但金圣叹指出,郑庄公其实是想永远霸占许国,“其计又远,心又孤,极欲瞒人,更瞒不得,于是乎遂成曲曲折折袅袅婷婷之笔”[6](P19)。诚如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时所言,“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8](P18),圣叹批《左传》,亦是圣叹文字,不是《左传》文字。可以说,金圣叹的评点是将《左传》的文本作为素材,进行了一次重写。

此外,金圣叹在对《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新五代史》等史书的评点中,一以贯之地延续了这一思路。例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赞》:“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其原意是称颂汉高祖的英明伟大,所以像萧何这样原本“录录无奇节”的人,因为追随汉高祖,“依日月之末光”,也能成为一代名相。但金圣叹却从“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一句,读出了司马迁在不得已歌颂统治者之外的叹息:韩信、英布“皆奇节人也”,但统治者总是喜欢碌碌无为的奴才,不喜欢有远大志向的豪杰,“可胜叹息!”[6](P192)对《史记·曹相国世家赞》的评点也是如此。《史记》对曹参本是大为赞颂的,但金圣叹却从文末的赞语中,发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列侯成功,惟独参擅其名”一句,指出太史公“忽然为淮阴侯洒泪”,“寄慨无穷”[6](P193),对历史上人才被扼杀的现象痛心疾首。

以广义叙述学为理论参照,可以重新思考金圣叹历史评点的价值。它不是教科书式的“就文论文”,而是对历史的深刻洞察。金圣叹是把历史作为一种叙述来加以评点的。他意识到,历史事实虽然在被叙述之前就已存在,但我们无法直接目睹历史事实,只能通过历史叙述才能遭遇历史,而历史的被叙述就是被重建。由此注意到了历史叙述与历史事实之间几近透明的区隔,并由此出发,抓住文本自身的悖论,对历史文本作了颠覆性的解读。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金圣叹乃至整个明清的诗文评点,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文学文本理论范畴比较研究》(10CZW002);200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文学文本理论范畴比较研究》(HB09BWX010)〕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 广义符号叙述学:一门新兴学科的现状与前景[J]. 湖南社会科学 2013(3).
[2] 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 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A].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4] 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 谭帆. 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M]. 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6] 金圣叹. 天下才子必读书[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7] 金圣叹. 读第五才子书法[A]. 水浒传会评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8] 金圣叹.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M]. 沈阳:万卷出版社公司,2009.
[9] 罗兰·巴特随笔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李卫华(1972—),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论虚构叙述的“双层区隔”原则

谭光辉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对虚构的解释是全书的一个亮点,他提出了“双层区隔”的原则,用以区别纪实与虚构的本质。“所有的纪实叙述,不管这个叙述是否讲述出‘真实’,可以声称(也要求接收者认为)始终是在讲述‘事实’。虚构叙述的文本并不指向外部‘经验事实’,但它们不是如塞尔说的‘假作真实宣称’,而是用双层区隔框架切出一个内层,在区隔的边界内建立一个只具有‘内部真实’的叙述世界,这就是笔者说的‘双层区隔’原则。”[1](P73)“双层区隔原则”的要义是要求叙述者与接收者之间达成了一个接受协议,“虚构型与纪实型叙述的区别,在于文本如何让读者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体裁”[1](P74)。双层区隔理论纠正并超越了从“风格”和“指称性”来区别纪实与虚构的理论模式,因为“风格”可以被视为“区隔标志”的一种,“指称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作者、接受者在网络游戏叙述中的界限模糊，而且对网络游戏叙述的研究可为各种网络叙述提供示范。

无论如何，叙述学必须面对叙述转向给叙述学的学科发展带来的种种挑战。我们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气迎接这种挑战，这样，挑战才有可能变成机遇。否则，叙述学就真的会在自我封闭中走向死亡。“叙述转向使我们终于能够把叙述放在人类文化甚至人类心理构成的大背景上考察，在广义叙述学真正建立起来后，将会是小说叙述学‘比喻地使用’广义叙述学的术语”[1](P17)。这意味着，叙述学在历经经典和后经典之后，为迎接叙述转向带来的学科挑战而进行的又一次自我调整，是叙述学发展的新范式革命。广义叙述学学科框架的建构，意味着以后的叙述学研究很难再返回以文学叙述为研究对象的经典叙述学与以理论侵入为特征的后经典叙述学轨道上去。因为传统叙述学研究那种对叙述概念的“默认程序”已经被打破，文学叙述研究在广义叙述学的学科框架中已经成为一种类型研究，而不再具有普遍价值。

笔者认为，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在叙述转向背景下建构了一般叙述的学理框架，对于叙述学研究来说，新范式革命才刚刚开始。托马斯·库恩曾经对“范式”有精彩论述，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能“空前地吸引一批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一是“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4](P10)。也就是说，新范式的建立要求其具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一批追随者，而且会为追随者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笔者认为，赵毅衡对于广义叙述学的理论框架建构是建立在“形式研究”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在形式之外，对一般叙述的理论建构还远没有结束。共性研究与个性研究作为广义叙述学研究范式的双翼，预示着叙述学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后富有充足的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2] 韦恩·布斯. 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A]. 詹姆斯·费伦，等. 当代叙事理论指南[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Martin Payne. 叙事疗法[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

[4]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王委艳(1977—)，男，河南省内黄县人，四川大学在站博士后，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理论、叙述学研究。〕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al Narratology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ZHAO Yi-heng

Chairman's words: The general narratology appears naturally, which is not a man-made but a cultural development. It is because of this that we have this discussion. Li Wei-hua finds out that ancient Chinese people talked about "general narratology", such as Jin Shen-tan who was conscious of document and fiction. Tan Guang-hui's principle of "difference and separation" from General Narratology by Zhao Yi-heng is well worth discussing. Wang Ying thinks that general narratology is the third stage of narratology. Wang Wei-yan thinks that general narratology represents China's theory of criticism. Zhao Yi-heng's division of level can be used in all kinds of narrations. The common sense of scholars is that general narratology does not have its own system, but as an academic area it needs more scholars, criticism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general narratology; division of level; double levels of difference and separation

〔责任编辑、校对：王维国〕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